

龚自珍对陶渊明形象的建构

——兼评陶渊明“忠愤说”

刘桂鑫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 崇左 532200)

摘要: 龚自珍《舟中读陶诗三首》有意夸大陶渊明性情中豪侠忠愤一面,既是龚自珍“尊隐”观念的体现,也是其自我形象的折射。“忠愤说”是自宋朝以来陶渊明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传统。龚自珍承袭又丰富了这一传统,这就是他建构陶渊明形象的内涵及价值。

关键词: 龚自珍;陶渊明;形象建构;忠愤说;传统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891 (2016) 05-0098-04

Image Construction of Tao Yuanming

LIU Gui-x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angxi Chongzuo, 532200)

Abstract: Gong Zizhen's *Reading Three Poems of Tao Yuanming in Baot* intends to exaggerate Tao Yuanming's heroism and loyalty, which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Gong Zizhen's concept of Loyalty and Indignation,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his self-image. The concept of Loyalty and Indignation is a prominent tradition in Tao Yuan-ming research since Song Dynasty. Gong Zizhen inherits and enriches this tradition, which is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ao's image.

Key words: Gong Zizhen, Tao Yuanming, image construction, loyalty and indignation, tradition

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舟中读陶诗三首》较为集中地揭示了陶渊明性情中豪侠忠愤的一面,因而比较受到重视,屡被称引。但究其实,龚自珍对陶渊明这一方面形象的有意夸大,只是他建构陶渊明形象的一种策略,本文联系龚自珍的思想观念及《己亥杂诗》创作背景揭示这种建构的内涵。

—

《舟中读陶诗三首》其一:“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①其二:“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两首诗均在突出陶渊明性情中豪侠慷慨一面,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首联系陶渊明《咏荆轲》、《停云》两诗诗意,认为陶渊明在刘裕篡晋后思欲为晋报仇的心事。龚自珍说陶渊明“喜说荆轲”,这是一个明显的误解,只是稍读过陶集的人都知道,陶集中只有一首咏荆轲。这显然是龚自珍的故意夸大。《咏荆轲》并不能证明陶渊是之豪,此诗艺术性也普通,说详后。至于《停云》诗意,刘履《选诗补注》:“此盖元熙禅革之后,而靖节之亲友,或有历仕于宋者,故特思而赋诗,以寓规讽之

意焉。此章言‘停云’、‘时雨’,以喻宋武阴凝之盛,而微泽及物。‘表昏’、‘路阻’,以喻天下皆属宋,而晋无臣无可仕进之道矣。”^②黄文焕《陶诗析义》:“四首皆匡扶世道之热肠,非但离索思群之闲悵也。”^③龚自珍糅合《咏荆轲》、《停云》两首诗意,认为陶渊明高声吟咏此两首时,心中仇嫉刘宋报恩晋朝的心情翻滚,并为江湖中缺乏志同道合之人而深深遗憾。但《停云》诗并没有这种思想情感。《停云》:“霏霏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逸,搔首延佇。停云霏霏,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竟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寔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诗前有小序:“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小序明言此诗为思念亲友而作。酒杯斟满新酿春酒,花园里鲜花开始绽放,此酒此景无佳友共为享用,因而叹息弥襟。诗首章“搔首延佇”,以动作写等待之情,二章“舟车靡从”写不得相聚,三章“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四章“愿言不获,抱恨如何!”直抒胸臆,诉说渴望及遗憾,全诗反复抒发的是“思亲友”之情。诗歌中“霏霏停云,濛濛时雨。八表

收稿日期:2016-09-10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5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文学世家与晋宋之际文学嬗变》(编号KY2015YB3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桂鑫(1980-),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自传及汉魏六朝文体学。

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等描写,确实容易让人感觉有影射动荡时局的可能,但即使有,也未必即影射刘裕篡晋。东晋自淝水之战后时局动荡不安。孝武帝是昏君,执政的司马道子是被《晋书》斥为“吴之宰嚭”的祸国权臣,君臣相争,导致朝政极端腐败。接着是王恭、殷仲堪两强藩两度联军进攻京师,孙恩卢循军事叛变,再次是桓玄篡晋,刘牢之、刘裕等北府将领崛起主宰时局。三四十年的时间如此,岂必一定为刘裕篡晋而发?不顾全诗而断章取义,抓住个别比兴的可能有的寓意附会于某一特定时事,这是旧诗评诗家的结习。

最先把陶渊明与诸葛亮联系起来的大概是辛弃疾,其《贺新郎》曰:“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224]这句话一般理解为陶渊明的风流与诸葛亮酷似。龚自珍也是这么理解,所以他在诗中自注谓“语意本辛弃疾”。但细揣辛词,他应该是赞扬陈亮一方面具有陶渊明一样的超脱清逸的风流,另一方面又酷似未出山的诸葛亮,胸怀大志而富于谋略,并非认为陶与诸葛亮相似。龚自珍更具体地强调陶渊明的“豪”。龚自珍所谓的“豪”,并非一定是任侠刺客的“豪”,只要在某一社会领域具有兴废继绝、继往开来的胆识与才干,都可谓豪杰。诸葛躬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每自比管仲乐毅,并为刘备提出三分天下进而争夺中原的战略思想,他作为豪杰当之无愧。屈原人格及《离骚》的精神内涵相当丰富,陶渊明“一分《骚》”指什么呢?屈原的人格,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忠国爱国,二是奋发自励,苏世独立,为实现美政理想,为保持清洁节操,“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最终至不惜投江以身相殉。这两点与诸葛亮报刘备知遇之恩、兴复汉室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相当相似,这大概是两者“豪”的原因。但屈原《离骚》以怨妇弃妇自比,充满着一种如泣如诉、哀怨缠绵的情调,却为诸葛亮所无,所以龚自珍要特别的提到陶渊明的“一分骚”。

《舟中读陶诗三首》其三:“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诗歌指出陶渊明性情不但有坦荡豪侠的一面,更有温和敦厚一面。受人一饭之恩则思死后相报,而杜甫便显得轻薄,受人酒食却只会诉说“朝叩富儿门”的艰辛屈辱。说陶潜性情温厚是对的,但说杜甫轻薄却不恰当。首先是所举例错误。陶渊明《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谐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劝,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陶渊明乞食之初虽然倍感难堪,但主人善解人意,不但给予丰厚馈赠,且设宴款待。主宾两人谈谐倾杯终日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很明显陶渊明并未受到歧视,相反,获得相当的礼遇尊重,且有“情欣新知”。杜甫呢?《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作一清客,早出晚归为富儿帮闲,所食为“残杯与冷炙”,岂有受尊重可言?任何懂得点人情世故或读有些心理学

知识的人都知道,礼物既包含实际的经济价值,也包含着情感价值。陶杜虽同为受一饭,而所包含的情感价值却何其巨大。

陶潜性情温厚除个人修养外,也是时代因素所致。东晋是门阀政治最为强盛的朝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躐高位,英俊沉下僚”。陶渊明虽为长沙公陶侃之后,但世系远而疏,实际是庶族,仕进并不乐观,因而后挫后心理落差并不大。但杜甫青壮年所处之盛唐时代却不一样。陈寅恪指出唐代在武则天执政之际,社会阶层发生升降之大变:“进士之科虽创自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非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相趋之若鹜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实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第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断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222]自武则天至唐玄宗世,山东尤其是关中旧贵族集团衰落而庶族士子迅速崛起并占据朝廷职位,起关键作用的是以试诗赋为主的进士科。因此,便不难理解杜甫提到自己诗赋才能的踌躇满志,也不难理解他“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愤慨,更不难理解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辛酸。同样是受人馈赠,但如果不注意到馈赠物品中所蕴含的馈赠者的情意的多少,如果不注意到时代给予的自我期望与现实的差距所造成的心理落差的强弱,而仅仅着眼于陶渊明杜甫接受馈赠的态度来论列两人的性情,是不客观的。

二

“忠愤说”是宋朝以来陶诗研究的一个传统,但缺乏比较坚实的依据,重要的一点是一直以来缺乏一部比较精确的陶渊明年谱。比如陶渊明研究中最大疑案的享年问题,便有52、56、63、76等几种主要说法,相差竟达20多年,这必然给作品的系年带来严重的问题。年谱的重要功能即在于把一个人的行事、文章言论放在特定的时空中加以探讨,以获得比较确切的理解。这点章学诚说得明白,年谱之体“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知之学也。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不可不致慎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4557-558]年谱是通过“细审行年,潜探心曲”^[53],从时间的客观性来判断诗人的客观命意所在。为文集编纂年谱之难,章学诚有深知艰苦之言:“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始末焉。然犹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鹵莽而失实者,则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其时事与推知作者之意,岂不难

哉。”陶渊明著文本无如此自觉明确的历史意识,再加以年代久远、资料匮乏,以及其“寄托”“寓言”的表现手法,则年谱编纂“穿凿附会与夫鹵莽而失实者”自然不可避免。

外证既缺乏,那对于诗文本身解读的所谓的内证又如何呢?比如《咏荆轲》一首,前人多认为是刘裕篡晋后陶渊明显欲报仇之作。如刘履《选诗补注》曰:“此靖节愤宋武弑篡之变,思欲为晋求得如此荆轲者往报焉,故为是咏。观其首尾句意可见。”蒋薰评《陶渊明诗集》曰:“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寻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评》曰:“抑公尝报诛刘裕之志,而荆轲事迹太险,不便明言以自拟也。”^[6283]就《咏荆轲》诗本身而言,根本看不出为晋报仇的意思。《咏荆轲》全诗如下:“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骖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公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刘履以为诗歌观诗首尾句意可知其为晋报仇。意谓“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中以“强嬴(秦王嬴政)”比刘裕,但时秦燕皆为诸侯,陶渊明如果那么执着于君臣名分,岂会有比晋为燕这等不合名分之事?诗中明言荆轲刺秦之动机为“君子死知己”、“公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为“死知己”为“后世名”而并非为忠义。这着诗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也比较一般,在陶集中实属相当普通之作。它的创新性相当有限。这首诗其实仅是隐括《战国策》、《史记》相关段落而成,承传的仍是班固《咏诗》所谓咏史诗正体,反而没有汲取左思革新咏史诗的经验。就其隐括而言,也无太多新鲜的东西,这对比《史记》相关段落便非常明显。《史记》叙易水送别:“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7254]通过描摹众人的神态、音乐及自然环境以渲染慷慨悲壮的气氛,描写手法并无不同。甚至到具体的词语意象,如怒发冲冠、变徵羽声、风水等,也无二致。至于“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也是鲁句践闻荆轲之刺秦王失败后感慨“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的翻版而已。读《咏荆轲》而觉得它抒情慷慨淋漓,只不过是因而荆轲的悲壮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其实引起这种强烈感觉的,是《战国策》、《史记》的相关叙述而非陶渊明的《咏荆轲》。甚至可以做这样的猜测,《咏荆轲》之所以乏善可陈,正是由于陶渊明缺乏豪侠的性情所导致。朱熹说:“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语言出来。”朱熹的这一说法历来很受重视,被誉为知言。其实,就日常经验而言,即使一相当懦弱之人,在某种悲壮气势的感召下也有可能表现出豪迈的言行精神,但岂能以此偶尔的表现便把这样表现视为“本相”?《咏荆轲》之所以受注意,无非是在陶渊明大量的平淡之作的衬托下显得有些刺眼罢了,岂能把此视为

陶渊明的“本相”?

弗洛伊德指出:“就判断人的性格的实际目的而言,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我们只要根据一个人的行动及其思想的自觉表现便足够了。”^[8304]知人论世以探讨诗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必须相当谨慎。陶渊明一生的行动及其思想的自觉表现,都与“忠愤说”有重大距离,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

三

陶渊明是否忠愤豪侠,缺乏有力的支撑。即使有,也根本不是陶渊明的主导方面,更不他的贡献成就的主要方面。但自宋以来对陶渊明这一形象的建构传统,并非没有意义。所谓传统,“乃是一种‘有效应的历史’,它不是固定的‘过去’,而是每一代人根据‘现在’的内在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指向‘未来’的进程”^[95]。对于竭尽全力呼唤时代改革的龚自珍更是如此。具体说,建构陶渊明忠愤豪侠形象,是他“尊隐”观念的体现,也是他辞职离京后自我形象定位的折射。

龚自珍认为其所处时代是一个衰世时代,而能够扭转社会衰落而重返盛世的人才,就是衰世时代居于山中的“横隐”。他在《尊隐》篇有非常明确的揭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嫫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从山川来,止于郊。而问之曰:何哉?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丑类窳眚,诈伪不材,是辇是任,是以为生资,则百宝咸怨,怨则反其野矣。贵人故家蒸尝之宗,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则窳人子篡之,则京师之气泄,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如是则京师贫;京师贫,则四山实矣。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不留京师,蒸尝之宗之子孙,见闻媮媮,则京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这段话描述了京师朝士及山中之民势力消长的原因及表现。最终汇集于山中的主要有四类。一类是君子,他们不是出生于皇家、外戚和世代官宦之家,但却拥有圣智心血、人功精英及百行百业杰出人才所凝聚的知识才干。一类是原来贫贱鄙陋的“窳人子”,却获得上层社会历代相承的美德才干,这是上层社会衰落而文化下移的结果。三是自公侯之家分裂而出的原上层贵族。第四类是轻视京师的“豪杰”。这四类人究竟具体代表社会哪个阶层,历来歧解纷纭,但毫无疑问,都是与朝士相对的“隐”。京师拒绝排挤人才,上层社会子弟又腐朽败落,无法补充提供人才新鲜血液,结果只能导致“丑类窳眚,诈伪不材,是辇是任”,国家已经如同“鼠壤”,稀疏松散,即将土崩瓦解。因此龚自珍预示由山中之民引导的时代改革即将到来:“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鼙声,夜之漫漫,鸛且一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因而他大力呼吁山中之民乘时而起成为“横天地之隐”:“是故民之丑生,一纵一横。且暮为纵,居处为横,百世为纵,一世为横,横收其实,纵收其名”,

“能大其生以察三时，以宠灵史氏，将不谓之横天地之隐欤？”

所谓“三时”，是龚自珍改革社会的观念基础。他依据《公羊传》“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社会的发展观，进一步发展新的三世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尊隐》篇有比喻的说法：“是故岁有三时：一曰发时，二曰怒时，三曰威时；日有三时，一曰早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龚自珍号召山中之民重视生命的意义，观察三时，投身到拨乱反治的社会改革之中，在当世获取改革实绩，从而受到史家重视，收取千载不朽名誉。通过龚自珍的“尊隐”观念，不难理解他塑造陶渊明形象的良苦用心。他彻底否定了陶渊明的平淡，而与刺秦的荆轲、终身“鞠躬尽瘁”于兴复汉室的诸葛亮以及不惜以身殉美政理想的屈原联系起来，视为同一类人。即使陶渊明真有忠愤豪侠，但也是潜藏于心而未付诸行动，但后三者却是真真正正不惜以命相殉。这种联系，岂不正是与龚自珍呼吁山中之民化情感为行动的体现？

龚自珍虽一心致力于改革，但历次的科举失利，始终被弃置在中书、主事等冷署闲曹之中，无法施展抱负。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1839年），大概是受到非常危险的政治迫害，连家眷都无法携带，匆促辞官离京南归。《己亥杂诗》，当然也包括《杂诗》中的《舟中读陶诗三首》，便是于归途中所作。“这一组诗，是龚自珍有意识地对前半生经历做一小总结而写的（当然其内容并不限于总结过去）。”^[10]《己亥杂诗》（二四一）：“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经裙。”“猿鹤”指君子，也就是《尊隐》篇提到的“横天地之隐”，回顾少年时期写的《尊隐》一文，他依然坚持自己当初的观点，仍然认为“横天地之隐”足以成为时代改革的力量。出处问题确实是他此时思考的重点。出仕似再不可能，那以一种什么方式“处”（隐）呢？历史上找不到可供借鉴的相似例子，出处问题要与妇女商量，是自嘲，也是特立独行、前无古人的自信。答案其实他已经清楚，即要做横隐。《己亥杂诗》（一〇四）：“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注：予平生不蓄门弟子）。”所谓“开风气”是指议论时政、提供改革的风气。他说，隋末隐居于河汾之间的王通，教授的弟子中有许多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如房玄龄、杜如晦等等。但因为王通仅是一卑微的处士，因而不少人颇怀疑他不是“名位千秋”的房、杜诸人的老师。龚自珍回顾一生，认为有一件是别人无法否定的，即他虽然不为师，虽然地位卑微，但依然开创了一代新风气，他也相信自己造成出来的人才最终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特别提到王通，除了历史作用相似之外，还在于“处士”的身份基本相同，尤其是辞了官的现在更是名副其实的“处士”了。此首诗对南归前所作所为的总评，那之后要从事什么呢？《己亥杂诗》（一四）：“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钟虞苍凉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瘖。”他希望继续自己的狂言，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挽救颓散堕落的人心。

作于同时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具体提到：“予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蒐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褥淫蒸，而与之萧疏澹荡，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沏之悲者，初秋也。今扬州，其初秋也欤？予之身世，虽乞余，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初秋比喻衰世。但衰世中尚有生机，“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沏之悲者”。衰世是他对时代所作的判断，身处衰世而期盼盛世是他最大的情感体验与奋斗目标，他明确的试图通过“甄综人物，蒐辑文献”加以实现。他《己亥杂诗》中对诸多历代人物的评论便是他“甄综人物，蒐辑文献”的结果，而对陶渊明、王通等处士的认同与建构，也融进了自己的人格形象，寄托了自己出处的心声。

“忠愤说”是自宋朝以来陶渊明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传统。陶渊明的忠愤，不敢遽定为无，但肯定被夸大、被强化了。这种刻意的渲染，其意义主要不在于是否得陶渊明之“真相”、“真心”，而在于其中所体现出的研究者个人及所处时代的精神与需要，这也是传统得以创造与延续的动力之一。龚自珍承袭这一“忠愤”传统，并注入自己的尊隐观念、自我人格，又丰富创造了这一传统，这就是他建构陶渊明形象的内涵及价值。

注 释：

- ① 本文所引龚自珍、陶渊明诗文分别出自王佩诤点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及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以下所引均仅注篇名。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陶渊明资料汇编[M]（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邓广铭. 稼轩词编年笺注[M]（定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3]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4] 章学诚.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 章沧授编注.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5] 张采田. 玉谿生年谱会笺·前言[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6]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陶渊明资料汇编[M]（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转引自余英时. 现代学术与学术[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9] 江 湄. 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0] 刘逸生.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前言[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罗瑞宁